

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

林慧君

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中文摘要

日據時期出生、成長在台灣的日籍作家新垣宏一（1913～2002），在台期間發表了近二十篇的短篇、極短篇（辻小說）小說，獲得由《文藝臺灣》雜誌頒發的「文藝臺灣賞」。本文以小說中的台灣人物形象為切入點，討論新垣的小說作品〈城門〉、〈盛り場にて〉、〈訂盟〉、〈山の火〉、〈山の父親〉、〈砂塵〉、〈船渠〉、〈いとなみ〉，觀察作家如何透過皇民指導者立場，為決戰體制下的台灣人指出「皇民化」道路。新垣宏一的灣生經驗使得他對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能有較近距離的形象捕捉，藉以在文本中發出滿足自我的他者之聲。從文本歸納出的流浪兒、女學生、留日學生、原住民、工人等各階級、性別層面的描寫，稍稍顯露了作家對台灣土地的執著，表現出台灣的地域特色，以補充殖民宗主國的文學版圖。但他無法擺脫身為日本人的優越感，不時以殖民者的聲勢出現在文本中，因而無法正視皇民化教育中衍生的問題。雖然新垣宏一的小說未能展現完整的文學理念，但他以自己生活範圍所能觸及的問題，透過對小人物的觀察刻劃，持續表現對主題的關注，是在台日人小說家中不能不被正視的個人特色。

關鍵詞：日據時期在台日人作家、新垣宏一、灣生、殖民文學

The Image of Taiwanese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Niigaki Kouichi

Lin, Hui-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ng G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Japanese writer Niigaki Kouichi (1913-2002), bor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raised in Taiwan, had published nearly twenty short stories and short-short stories in Taiwan, and received the “Literature Taiwan Award” from the Literature Taiwan magazin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figures in his writings, including “The Gate”, “In the market”, “Engagement”, “Fire of the Mountain”, “Sand Dust”, “Dock”, and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observe how the author, from the viewpoint of civil imperial leader, pointed out the road of Japanization for the Taiwanese under the system of national battle. Niigaki’s Taiwanese experiences made him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in colonized Taiwan, thus capturing their images and expressing others’ opinions of the contented self.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piction of figures of various classes and both genders, including young drifters, female students,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boriginals, and workers, revealing his persistence to the land of Taiwan. His works also demonstrat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and supplement the literary works in the colonial country. However, he couldn’t throw off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of as a Japanese, thus had appeared in his writings as colonists, without seeing through the real problems of imperial residents' education. Although his writing did not completely reveal the literary ideas, he showed continuous concerns on topics in his life and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rivial figures; thus, h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writer with distinguishe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Japanese writers in Taiwan.

Keywords: Japanese writers in Taiwan, Niigaki Kouichi, Wansei, Colonial literature

新垣宏一小說中的台灣人形象

一、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發展概況

日據時期有不少日本人作家活躍於台灣文壇，回顧日人作家在台灣的新文學發展，最初受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中央文壇新文學盛行、三〇年代無產階級文學盛行的影響¹，出現個別零星的創作，隨著台灣的文藝雜誌、報紙創刊發行，日人作家發表作品的質與量逐漸成長。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報刊在總督府軍部的壓力下撤廢漢文欄，文學作品在日語的語言制約下發表受限，在台日人作家因此取得文學活動的主導地位。

以西川滿為首的「臺灣文藝家協會」，結合島內台日文藝人士、學術文化菁英，於四〇年代發行《文藝臺灣》，至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七卷二期停刊為止，刊載了在台日人的小說約六十部。一九四一年五月對西川滿編輯方針不滿的張文環、中山侑等人另組「啟文社」發行《臺灣文學》，這個帶有繼承台灣新文學運動傳統色彩的陣營，也有中山侑、中村哲、藤野雄士、田中保男、藤原泉三郎、坂口禱子等在台日人作家加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終刊為止，《臺灣文學》刊載了約四十篇小說，其中在台日人的小說佔了一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臺灣決戰文學會議」後，《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等雜誌因「戰鬥配置」所需廢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台灣奉公會發行機關誌《臺灣文藝》，至一九四五年一月為止，刊登了十幾部小說，以《文藝臺灣》集團的作家佔大多數。此外，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為止，在台日人也刊行了二十多部的小說集，再加上散見於當時各報章雜誌的小說，目前可見的在台日人小說共約二百部。

依筆者所見的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以作者姓名計算約有六十位，生平不詳者佔多數，可考者不到二十位²，分別來自日本不同地區，普遍擁有高教育

¹ 參考志馬陸平（中山侑），〈青年と臺灣——文學運動の變遷〉8、9，原刊於《臺灣時報》（1936年11、12月），引自黃英哲主編、涂翠花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第2冊，頁199-200、232。

² 參考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6月）。

程度，面對殖民地社會與人民，具有身為純日本人的優越意識。他們都不是專職作家，在台灣大部分從事教職，如擔任小學教師的坂口禱子（婚後居住台中）、大河原光廣、德澄晶、龜田惠美子，任教於高等學校的河野慶彥、濱田隼雄、新垣宏一等。或在總督府所屬機關工作，如文教局編修課的新田淳、台北放送局文藝部的吉村敏，以及在總督府支持的《臺灣日日新報》文藝欄任編輯近十年的西川滿。

以小說涉及的人物描寫而言，坂口禱子、西川滿、濱田隼雄的小說以較多的主題涵蓋多種人物，其次是新垣宏一。從作品的質與量來看，這四位作家可以視為日據時期重要的在台日人小說家，他們對「原住民」與「農業移民」題材的注意，是台籍小說家受限於客觀條件而較少描寫的。由於對純血觀念的敏感，為呼應殖民政策中的「內台融合」口號，坂口禱子、庄司總一特別關心台灣人皇民鍊成、混血兒身份認同的問題，川合三良等具有灣生身份的作家對灣生的身份認同著墨較多。「台灣女性」是殖民者建構他者的對象，西川滿的異國情調女性描寫篇數最多，但以描寫的深度而言，女性作家的表現較為深刻。台籍小說家較少嚐試的「歷史人物」，西川滿、濱田隼雄積極創作，表現殖民者統治台灣的觀點，藉此改造並滲透台灣歷史，以呼應大東亞共榮意識。隨著決戰體制的形成，在台日人小說家比台籍小說家更積極熱切的呼應總督府的國策要求，以描寫志願兵、產業戰士、大後方女性等人物，作為響應「聖戰」的小說創作。

在眾多日人作家中，小說創作量最多的是西川滿，相關的評論研究也很豐富³。西川滿與統治階層若即若離，卻又與總督府文藝政策若合符節的情形，使他具有日據時期台灣文壇領導人的形象。考察西川滿小說創作的軌跡，也可看出在台日人小說發展的方向，不論是取材於台灣風物、民間傳說的傳奇式小說，或是雜揉台灣歷史、野史、地誌的歷史小說，充分呈現以異國、異色的筆調書寫台灣風物的耽美浪漫風格走向，雖然講求藝術至上主義的作風，但作品中所發出的殖民統治者聲音也不曾間斷，在與日本中央文壇呼應之際，也呈現了殖民地文學的特色。西川滿以外的在台日人小說家與作品的個別研究，也能讓在

³ 可參考中島利郎編，〈西川滿研究文獻目錄〉，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2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491-507。

台日人小說的發展浮現清楚的輪廓。本論文以和西川滿關係親近的新垣宏一的小說為研究對象，觀察擁有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並擔任教職經歷的日人作家，在小說中展現的殖民文學樣貌。

二、新垣宏一傳略（至 1945 年）

新垣宏一（1913～2002），出生於台灣高雄，本籍為日本德島。在殖民地台灣受教育，三〇年代就讀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時，曾於《臺灣文藝》（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新文學》等刊物發表詩作、小說、評論。畢業後任教於台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於西川滿主導的《媽祖》、《華麗島》、《文藝臺灣》等刊物發表作品，文風與西川浪漫華麗的異國情調不同。

新垣宏一於台南任教時，因喜愛佐藤春夫的作品〈女誠扇綺譚〉，熱衷於台南的歷史調查研究，曾於《臺灣日報》發表關於佐藤春夫的相關評論，如〈佐藤春夫のこと〉（1938）、〈佛頭港記〉（1939）、〈女誠扇綺譚と臺南の街〉（1940），對於小說原型與場景的追蹤調查，留下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⁴。而新垣於小說〈砂塵〉（1944）中描寫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解說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的情節，可說是借用〈女誠扇綺譚〉再生的作品，被納入〈女誠扇綺譚〉作品系譜⁵。

一九三五年新垣在《臺灣新文學》創刊號的「反省與志向」意見調查中，提出對台灣新文學的期望，認為與其強調「鄉土色彩」，不如先鍛鍊好寫作本領，和日本本土描寫同一種類的世界可以磨練本領。主張鄉土色彩也很好，但不要侷限於鄉村景物，台北街道也有台灣的鄉土色彩。新垣期許日本人能更融入台灣人的生活，寫一些感人的愛情小說⁶。此說遭平山勳評為是「對福爾摩沙的現象形態無知的自我辯護」，為日人作家無謂的「專長」⁷。身為在台灣的第二代日本人，新垣宏一此時的創作理念，從對台灣新文學發展顯現出與台灣人無關

⁴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壇における「女誠扇綺譚」受容の行方〉，《芸文学会》83（2002年5月），頁23-24。

⁵ 邱若山，〈「女誠扇綺譚」とその系譜〉，收入《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台北：致良出版社，2002年），頁197-200。

⁶ 《臺灣新文學》1（1935年12月），頁48，以新垣光一的筆名發表。

⁷ 平山勳，〈歷史小説への待望の拔萃——「敗北の理論」第三章一〉，《臺灣文藝》3卷2期（1936年1月），頁22。

的態度，直截表現出對日本本土文壇的嚮往與模仿傾向。面對同為在台日人（雖然各有不同的背景）卻侷限於日本人生活圈的現象，以他在殖民地台灣南部出生成長的背景，對日本人提出要更融入台灣人生活的呼籲，可說是新垣與西川滿同中求異的表現⁸。至四〇年代新垣在同人誌上雖然發表不同題材的作品，但創作理念大抵也未超越三〇年代的視野。

一九三七年擔任教職後，任教的學校較多台籍學生，新垣開始認真思考「真正的台灣」⁹。一九四一年六月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第二世の文學〉¹⁰一文，可看出新垣作為在台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的自我期許，認為這些在台灣出生、受教育並已在台灣社會工作的日本人，根已扎在台灣，與台灣土地有著深厚的血脈情感。文中批評了移居來台日本人的過客心態與優越感。面對內地人批評第二代「本島人化」的部分，新垣認為那是與本島人共生共感的表現，認為自己已是台灣之子。身為當時被稱為「灣生」的在台第二代日本人，新垣宏一主張文學不應再沈溺於望鄉的題材，也不宜再暴露殖民地內地人的生活情景了，而是要寫出能對台灣產生感情的、有台灣泥土花草芬芳的文學，並認為這是第二代日本人作家責無旁貸的工作。新垣此文發表後，雖然得到台北高校教授鹽見薰的讚揚¹¹，卻引起台南第二高女同事反感，於是年（1941）轉任台北第一高女，與濱田隼雄成為同事¹²。

這篇表現出新垣土地認同的文章，為何不能獲得同族人的共鳴，由於筆者尚未發現可以相互參照的文獻，只能就文意推測。對母國的嚮往和殖民地的批判，可說是殖民者常見的取材方向，筆者曾就所見在台日人小說由「身份」和「認同」兩大主軸歸納出幾個重要主題，不論是描寫「原住民」、「台灣女性」、「農業移民」、「身份認同」、「聖戰」或「歷史小說」，文本中難掩作家以嚮往母

⁸ 和泉司指出，新垣應是有意識的區隔自己與西川滿所描寫的台灣，因而強調一己更深刻融入台灣的態度。參考〈新垣宏一「砂塵」論——「異文化を見る」という視点〉，《三田国文》38（2003年12月），頁33。

⁹ 新垣宏一著、張良澤編譯，《華麗島歲月》（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45。

¹⁰ 新垣宏一，〈第二世の文學〉，《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17日、19日。

¹¹ 鹽見薰，〈第二世の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7月25日。

¹² 新垣宏一著、張良澤編譯，《華麗島歲月》，頁61。

國的精神批評殖民地的種種¹³。而在台日人這種習而不察的寫作缺失卻經由「灣生」指出，在台日人的反感可以想見。

「灣生」是日據時期日人用來指稱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日本人，詞彙含有憐憫和輕蔑的意味¹⁴。從日本本土的角度來看，殖民地台灣總是低劣的，一些與台灣有關的詞彙，如灣官、灣吏、灣製、灣紳、灣記者、灣商、灣風呂、灣妻等，都帶有次等甚至歧視的意思¹⁵。灣生不論在台灣或在日本往往被視為「外地」的人¹⁶，他們在熱帶台灣出生、成長，以及受教育，卻總是像個旁觀者般，如同美濃信太郎〈過客〉中的灣生佐佐木所說的：

於台灣我既是同鄉人，同時也是異鄉人。¹⁷

灣生介於殖民母國日本人與殖民地台灣人之間，在自卑感與優越感的雙重精神下，既沒有第一代移民的祖墳信仰，也沒有農業移民的土地認同，而且灣生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語言論述往往多於實際行動，結果只是在殖民指導階層中尋求立足點¹⁸。

新垣宏一的言說顯示出他能將「灣生」的「弱點」轉換成他的「台灣特色」，然而在面對來自本土日本人時也不免心生妒羨，面對台灣人時又有揮之不去的

¹³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

¹⁴ 庄司總一，《陳夫人》（1944年通文閣版，リバイバル外地文學選集第二回配本第二十卷），（東京：大空社，2000年），頁250。

¹⁵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東京：田畑書店，1995年），頁80。島田謹二探討明治時期日本散文、小說中出現的台灣，推論日本對殖民地台灣的刻板印象有一大半是來自明治文學家的描寫，內田魯庵〈臺灣土産〉提到當時流傳著：「去臺灣的人如果不是流浪漢，就是些來歷不明的傢伙。」當時一般的日本人對於會去台灣的國人，多少持有這種偏見。〈明治時代內地文學中的臺灣〉，原刊於《臺大文學》4卷1期（1939年4月），收入黃英哲主編、吳豪人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2冊，頁357、360、369。

¹⁶ 日本帝國時期把日本原有的領土稱為「內地」，日本本國人稱「內地人」，因此日據時期在台日人被稱為「內地人」。但對台灣漢人和原住民而言，所謂「內地人」其實是「外地」來的入侵者。對居住日本本土的「內地人」而言，在台「內地人」是移住「外地」的人。灣生的處境顯得更容易被視為是外地人。參考游珮芸，《日治時期台灣的兒童文化》（台北：玉山社，2007年），頁19-22。

¹⁷ 本文依據《臺灣公論》（1942年12月、1943年1月），頁151。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¹⁸ 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中灣生的認同歷程〉，《國文天地》25卷3期（2009年8月），頁56-61。

優越感，處於中間的不均衡心態，令他在自我形塑時發生矛盾，使得他興致勃勃發表的「第二世文學」主張，不僅不能被周遭的同事接受，而他所謂的對台灣的感情、有台灣泥土花草芬芳的寫作方向，和當時台籍作家如張文環等人所致力故鄉書寫截然不同，因而新垣所思考的「真正的台灣」令人玩味。

新垣宏一以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的經歷，使他在創作皇民化主題作品時，能以較近的距離掌握「他者」，他將平日研究台南文化的成果融入作品中，例如〈城門〉（1942年1月）、〈盛り場にて〉（在市集，1942年4月）、〈砂塵〉（1944年1月）所呈現的台南風景，〈訂盟〉（1942年12月）中論及的傳統婚俗，呈現日人眼中的台灣風情。身為教育工作者，新垣宏一慣於以教師為小說主角，以表達其對於皇民鍊成、國語教育與舊慣習俗的見解，顯示出身為教師的使命感。〈盛り場にて〉中流露出對處在台灣社會邊緣少年少女的關懷，〈山の火〉（1943年4月）中描述在台日本人教化阿美族壯丁的熱忱，都可能是新垣長期在台灣生活圈中所能注意觀察的，形成新垣的小說選材有個人特色，也不時表達對被殖民者的關心，但身為指導階層的意識，對台灣人仍無法有更深入的心理刻劃，處理小說中台灣人的問題，往往顯得隔靴搔癢。

新垣經常在小說中花許多篇幅說明台灣夜市的吃食、婚禮習俗等，顯得瑣碎冗長，但這是作者有意透文學作品，加強日本本地讀者對台灣的了解，例如以「握壽司」手藝比擬烹煮台南担仔麵的技術，或以「漢和字典般大小」描述台灣的小竹椅，是作者苦心思索的結果¹⁹。和泉司指出活躍於《文藝臺灣》的在台日人作家，多少都同時持有「中央志向」、「台灣作家」兩種意識，新垣也不例外²⁰。

隨著台灣進入決戰體制，新垣的小說也有著濃厚的戰爭氣息，在總督府情報課派遣命令下的小說創作〈船渠〉（1944年11月），敘述本島造船工人如何增產奉公的過程；〈此の手、此の足〉（1944年12月）以大東亞戰爭為背景，刻劃特

¹⁹ 新垣宏一，〈外地の情趣〉，《臺灣地方行政》8卷7期（1942年7月），頁20-22。

²⁰ 和泉司以〈砂塵〉中對於台灣特有用語如「公學校」、「志願兵制度」、「藝妲」並未加以說明，文中也唐突出現「安平」、「斗六」等地名。顯示新垣雖有「中央文壇的志向」，但受限於在台日人二世較乏日本本土經驗，對「日本內地讀者」群像無法確實掌握，造成新垣的「中央文壇志向」實踐得不夠徹底。前引文，頁40-41。

立獨行的女學校校長行誼；〈醜敵〉（辻小説，1944年11月）、〈いとなみ〉（營生，1945年1月）描寫戰爭體制下的生活面貌，可說是作者現實生活的寫照。

一九四三年新垣宏一獲得由《文藝臺灣》雜誌頒發的第二屆「文藝臺灣賞」，在雜誌社「樹立皇民文學典範」的宗旨下，新垣以該年度發表的四篇小說獲得審查委員矢野峰人、島田謹二的青睞，審查評語為：

觀察細膩已達熟練地步……能掌握活用特殊題材，平穩而巧妙地開展，令人十分佩服。氏可說在本島短篇作家中具有不可動搖地位的。²¹

較之於同期活躍於《文藝臺灣》的在台日人小說家而言，新垣宏一的作品取材顯現出個人特色，有不同於西川滿異國情調式的南方憧憬書寫²²；較之濱田隼雄集中刻劃在台日本人，新垣則有較多內台融合的書寫²³；問題意識也比寫作技巧純熟的川合三良自傳體小說明顯²⁴。本論文以「台灣人形象」為切入點，討論新垣在小說中從皇民指導者立場，融入台灣人生活的程度，如何為決戰體制下的台灣人指出「皇民化」道路。

²¹ 《文藝臺灣》6卷4期（1943年8月），頁39，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²² 西川滿（1908-1998）出生於日本福島，二歲時隨家人來台。在台灣完成小學、中學教育後，至日本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攻讀法文。1933年返台後以文學和出版活躍於殖民地的文化界。1939年組織「臺灣詩人協會」，創辦新詩雜誌《華麗島》，於1940年改組為「臺灣文藝家協會」，主導編輯刊物《文藝臺灣》，在該刊陸續發表許多小說。其小說不論是取材於台灣風物、民間傳說的傳奇式小說，或是雜揉台灣歷史、野史、地誌的歷史小說，旨在台灣追求一個與日本內地不同的南方文學，以台灣風物、歷史當作文學素材，創作出浪漫抒情與異國情調的美感，在講求藝術至上主義的作風中，代表殖民統治者發聲的意圖也不曾間斷。

²³ 濱田隼雄（1909-1973）日本宮城縣仙台市人，十七歲赴台就讀台北高等學校文科乙類，與中村地平創立高校生純文學刊物《足跡》，畢業後進入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專攻國文學，並熱衷參加社會主義運動、農民運動。1932年在東京參與雜誌《實業時代》編輯工作，但由於對東京生活感到幻滅，1933年與母親再度來台。曾任教於台北私立靜修女學校、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師範學校。與西川滿同為《文藝臺灣》中具影響力的作家。濱田隼雄在小說中經常對在台日本人提出批判性的關心，農業也是濱田的創作題材，他的文學關注在寫實主義和台灣的現實狀況，但可能對台灣人的實際生活缺乏認識，小說所描寫的對象多以在台日人為主，也是率先實踐文學奉公理念的作家。

²⁴ 川合三良（1907-1970）日本大阪人，1935年來台加入父兄經營的「川合合名會社」。在台期間創作集中在1940到1943年間，與西川滿關係良好，小說皆發表在《文藝臺灣》，作品具有濃厚的自傳色彩，經常以台灣為舞台，將台灣視為日本「國土」一部分，或寫在台日人處境，或寫日人家庭日常生活，並反映戰爭的經驗，十分符合國策文學的要求，台灣雖然成了書中人物鄉愁的所在，但往往缺少在地的深刻情感。

三、流浪兒的形象

〈盛り場にて〉(在市集)²⁵以台南鬧市「沙卡理巴」為背景，介紹攤販的特色、熱鬧的景況，帶出依附在鬧市下流浪兒孤寂無依的生活情狀。敘述者以熱鬧來映襯人心的寂寞，將目光集中在這群無家可歸的少年生活，是四〇年代殖民者小說中少見的題材。

這群流浪兒白天晃蕩在市集人群中，有如松鼠般敏捷；深夜露宿打了烺的店家屋簷下、空箱子上，夏天受蚊蟲叮咬，冬天受寒風吹襲，有如野狗般悲慘。少年陳啟端是其中的一個，扒竊遊客錢財失手拔腿逃走後，便膽怯不敢再出手，靠著同在鬧市打混兄弟林天來（十五歲）的施捨生存。啟端有了幾個錢也會去打小鋼珠，看不順眼上公學校的孩子也來玩，便學著平日日本人斥喝他的口調罵「馬鹿野郎」（混蛋），哼著從咖啡座「桃源亭」外聽來的「支那之夜」曲調，一副小大人的模樣，寫出了卑弱者自尊無所措的窘態。

「桃源亭」是個模仿日本咖啡座的喫茶店，但十分陰暗髒亂，服務生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少女，濃妝豔抹得像個小大人以討客人歡心。客人多為二十歲上下的小伙計、少年工，抽抽菸、共飲一瓶啤酒，哄鬧忘我消磨一晚。才十幾歲的啟端一心嚮往「桃源亭」，可以在裡面喝著怪味的咖啡，吃著水果切盤，和女侍並肩坐在椅子上，此景對啟端來說有如天國般可望不可求，光空想便高興得不得了。啟端暗戀著「桃源亭」女侍阿金，聽聞她受養母聘金制約的事，勾起自己受繼母虐待的往事，但啟端覺得阿金比自己還可憐，慶幸自己不是女生。阿金說以後要嫁「志願兵」，啟端以他有限的知識，把「志願兵」和水島巡查經常向他提起的「青年團」作一聯想，心中燃起了一絲希望。

啟端遲遲不敢越雷池一步走進「桃源亭」，原來是懼怕水島巡查。負責此區已三年的年輕巡查水島，是流浪兒又敬又畏的對象，尤其是啟端，曾因過食番石榴籽腹痛難當，被水島抱到附近的醫院醫治，之後每次水島總要拍拍他的屁股問他近況，做錯事被水島斥責時，啟端總是情不自禁的喊著「阿母啊」討饒。水島成了啟端卑下生活中唯一的保護者，結合了嚴父與慈母的形象，他要啟端

²⁵ 《文藝臺灣》4卷1期（1942年4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上「皇民塾」學日文，快快長大加入青年團，也曾告誡啟端「絕不可以當小偷，肚子餓了隨時都可以找我」²⁶。水島代表的殖民教化者形象，是唯一同情孤苦無依啟端的人，並帶給他未來希望，即學會日語，成為皇民。

然而啟端不能明白，為何水島巡查不去救助比自己還可憐的阿金。越想越悲傷的啟端竟動了竊心，打算下手偷停車亭內的一部全新腳踏車時，被管理員逮個正著，飽受一陣拳打腳踢，聞風前來的水島巡查鐵青著臉，兩手緊抓著啟端激動的搖晃著，嘴裡罵著「混蛋」，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身心受創的啟端很想再喊一聲「阿母啊」，卻只是號天大哭起來。

新垣宏一在這部短篇小說中以流浪兒的視角出發，折射出繼母虐待子女、養女、聘金等問題，側寫了國語講習所日本老師耐心教授日語的情形，以及日本巡查對流浪兒的愛心等，對啟端為生活所迫的早熟行徑與不平衡的內心世界多所著墨。至於啟端為何不遵循水島巡查的教誨從良，似乎訴說著階級、民族二重限制下邊緣人「重生」的困難，日本巡查提供啟端溫飽與教養的可能，但並不能解決啟端內心的匱乏。啟端對阿金的同情與愛憐，亦即阿金比自己更多了性別的壓迫，令他無法全然信服水島，心中萌發相憐的愛意讓啟端再次行竊失風而被捕，徒留下巡查不解的失望與無奈。啟端對水島無視於阿金的事不能明白，水島對啟端的不受教無法釋懷，一個形象良善的地方巡查，一個頑劣但渴望愛的流浪兒，二者間所產生的衝突，就如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存在的距離，以及因之而起的殖民者不願面對的問題。

四、女學生的形象

日本殖民台灣初期對台灣女性教育態度消極，女性教育附屬於男性教育下，一八九六年成立的「國語傳習所」即採取男女共學制。一八九八年發布《臺灣公學校令》，將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雖然為女學生增設了裁縫科，但台灣女性的就學率要到女子公學校設立才得以提高。一九二二年總督府重新修訂了《臺灣教育令》，改採「內台共學制」，收八至十四歲兒童，教授國語、修身、

²⁶ 《文藝臺灣》4卷1期（1942年4月），頁20。

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等。一九四一年發布的《國民學校令》，將小學校（專供日籍學童）、蕃人公學校（專供原住民）與公學校（專供台籍學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一九四三年始實施義務教育²⁷。

總督府在一九二二年發布的第二次《臺灣教育令》中規定，中等以上學校為內台共學制，女子學校名為「高等女學校」（四年制），教育主旨在培養嫻淑溫雅的日本女性，為達同化台灣人目的，特別增列精通日語和確立日本國民性格。一九四一年後，更重視女子在國防、生產和生活上的訓練，以確切涵養「皇國女子」、「皇國之母」，以協助完成「聖戰」²⁸。

從國民學校到高等女學校，是日據時期台灣女子接受新教育的管道。殖民宗主國透過教育，強化學生皇民思想，以確切涵養皇國國民性格，成為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基礎。由於教育機構並未公平開放，台籍女學生在初等教育內容不均等、入學考試強調日語能力的不利條件下，進入高等女學校窄門時必須與日本籍女學生競爭，也使得價值認同一步步傾向日本化。反映在小說中的女學生形象，展現了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樣貌，成為宣傳皇民教育的對象。

新垣的〈城門〉²⁹透過台灣大地主家庭少女劉金葉寫給女學校時期老師的書信，細訴自己努力成為皇民所產生的種種苦惱，包含著對「家醜」與父親的批判，展現親近的師生關係。從金葉對祖父選擇日本式葬禮的崇敬、對父親高喊皇民鍊成卻仍蓄妾的鄙夷，以及對自己升學、婚姻的憂慮中，看出金葉受了皇民意識的影響，對台灣傳統的喪禮、家庭結構、城門建築、語言和服飾等表現出「羞恥」感，顯示出受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女性，對「皇民化」即「現代化」的迷思，也帶出了殖民政策即使獲得被統治者表面化的配合，但內心對舊慣習俗仍存在著無法切割的問題。

原本存在的祖孫世代差異，由於殖民者的皇民化要求，使得金葉與祖父、父親與母親間的親情，摻雜了文化衝擊下的矛盾。在金葉口中屬於舊時代人的祖父，和自小受皇民教育的自己雖然語言隔閡，但在血脈相連的親情下，金葉

²⁷ 參考游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頁47、59-60。

²⁸ 同上註，頁55-56。

²⁹ 本文依據《文藝臺灣》3卷4期（1942年1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卻能了解祖父以台語告訴她的民間故事。只是不會說日語也不穿和服的葉老先生，就因為疼愛孫女，不願讓孫女看到日皮台骨的異樣葬禮，接受了孫女的皇民化「新訊息」，生前即交代喪禮採日本式的火葬，至此祖父成了金葉心目中性情相通的「好日本人」。

相對於祖父的包容力，擔任市議員的父親劉木川，對金葉十分寵愛，因父親的社會地位所帶來的皇民化生活，也令金葉在女學校生活中保有「優越感」，對父親在議會中提議將台南的舊城門改建為公廁的「謬論」十分贊同。金葉一心只想早日擺脫台灣式的生活，以活在「新」時代。但父親將母親當年陪嫁的女傭納為妾的事，加上母親也不置可否的態度，令金葉憎惡台灣男性，在為母親感到悲哀之餘，更擔心自己將來的婚姻也將遭所謂「第二夫人」的威脅，因而既欣羨日本人的家庭生活，又批判父親不能貫徹皇民化的生活，甚至質疑父親對自己的愛，認為不懂皇民鍊成理論卻能溫暖包容自己的祖父才是偉大的，就如同那些連低階教育都沒受過卻能血書志願從軍的青年一般，敘述者所歌頌的便是這種毫無掙扎的順民形象。

透過金葉信中的文脈，作者也傳達了身為皇民化指導者的理念，對金葉所憂慮的納妾風俗，「老師」認為在提高「皇民鍊成」實績的前提下將來一定會消失。對台灣人大都選念醫科的現象認為是把學校教育窄化為追求物質安定的手段，主張像金葉這種富家子女，應學習可以提升自己教養的課程，以備將來能在台灣的文化相關部門貢獻力量。師生到東京畢業旅行時，對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以台語交談的事感到痛心，但「老師」安慰金葉：

在東京過那種生活的人果真了解自己嗎？為在東京的自由而沾沾自喜的精神果真能解救台灣嗎？能成為台灣進步的積極力量嗎？想要提升台灣的話，就應該生活在台灣，與台灣一同成長。³⁰

在殖民者合理化統治行為的修辭下，台灣需要被「解救」、被「提升」。「老師」耐心開導的態度令金葉十分感激，認為不只解救了她個人的危機，透過她

³⁰ 《文藝臺灣》3卷4期（1942年1月），頁68。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又不知造就了多少堂堂的皇民。言語間充滿了對以「老師」為首的皇民的孺慕，表現出自身投入皇民化運動的熱忱。

作者將接受現代教育女性的視角代之以皇民鍊成的視角，傳統彷彿都是些去之而後快的惡習，顯示接受越高教育的殖民地台灣女性，雖然因為學習日語得以獲得新知，擴大生活範圍，但並未因此樹立女性自主權。甚至日本的「教養」越深，越游離台灣在地的社會土壤，形成洪郁如所說的「和」「洋」折衷文化的新階層³¹，在指導者的薰染與期待下，成為家庭、社會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潛在力量。

由於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女子教育偏重於上流社會，女子教育逐漸成為一種身份階級的象徵³²。出身中下階層家庭的女學生則成了「千金小姐」群中的異數³³，引起了作家的關注，而熱心皇民教化的教師形象又再次出現在新垣宏一的作品〈砂塵〉³⁴，敘述台南女學校的教師澤野，利用作文課時間向畢業班學生解說佐藤春夫以台南為舞台的小說〈女誠扇綺譚〉，藉其中可憐女婢的下場，評介人身買賣的陋習，並期許女學生們向皇民生活邁進，想不到因此觸發了女學生陳寶玉的煩惱，向老師傾訴自己無可奈何的處境。

陳父阿木製作日漸落沒的傳統台灣傘，行情不佳但也無力改行，夫妻每天苦悶的工作著。哥哥陳天賜，公學校畢業後成為志願軍夫，寶玉、金鳳的學費也因此得以免除。兒子的出征令陳父憂喜參半，擔心家業從此中斷，但他聽說許多安平出身的軍夫在上海表現很好，訝異於平日懶洋洋的兒子也能上戰場。寶玉把從學校聽來關於戰地的軍夫何等榮耀的事告訴阿木，終於發揮了「教化」作用，有子赴戰地的阿木高高興興工作，有時怪腔怪調地哼著〈榮譽的軍夫〉³⁵，

³¹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東京：勁草書房，2002年），頁366。

³² 同上註，頁123。

³³ 和泉司討論〈砂塵〉時提出教師澤野以〈女誠扇綺譚〉作為上課談話材料，無視於故事中富家女的下場，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意識，完全是野澤自我滿足的言行。特別提出「寶玉」的出身在女學校的特殊性（日文為「異分子としての宝玉」），教師澤野對窮學生的處境反應遲頓、動輒誤解，處理她的人身問題也只是方便自己，未能真正站在寶玉的立場。和泉司透過文本中師生互動的情形，從教師澤野、敘事者等角度深入分析、辯證，提出〈砂塵〉暴露了作者對台灣人的「無神經さ」（筆者解讀為「漠不關心」，亦即欠缺「同理心」），是一篇不完整的作品。前引文，頁37-43。

³⁴ 本文依據《文藝臺灣》7卷2期（1944年1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³⁵ 「榮譽的軍夫」是日本統治當局鼓勵台灣人踴躍從軍的「時局歌」歌名，利用鄧雨賢的

經常看著天賜的相片，並向鄰居林先生炫耀。只是軍夫的「榮譽」無法挽救家庭手工業不順、夫妻感情不睦，以及以女兒抵押借貸、家庭瀕臨破碎的困境。

陳阿木自暴自棄的沉迷於賽馬，輸了一身債後，竟以女兒寶玉、金鳳抵押，向高砂町周某借了五百元，又輸了錢後不見人影。寶玉姐妹陷入不知何時要被債主押走的恐懼中，二人決定休學工作以償還債務。澤野一方面覺得再兩個月就可以從高女畢業的寶玉，休學實在可惜；一方面又覺得這樣的遭遇，彷彿回到〈女誠扇綺譚〉中無智純情下婢所處的時代，令他質疑女學校教育到底發揮了多少效果，學校一味加強皇民鍊成，卻沒有人教寶玉如何以日本精神面對人生難題。澤野承認自己的教育基磐脆弱，本以為透過皇民化教育學生，就可以完成將日本精神傳達至家庭的任務，寶玉的事讓他發現自己的想法過於單純，於是開始反省如何將皇民鍊成的精神傳達給無智階級，亦即貧窮學生的父母。和泉司指出將人身買賣與皇民教育切割，正顯示出澤野並不是真正想透過學校教育達到皇民鍊成的目的³⁶。筆者以為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女子的教育目標，只是將依附順從的對象從母國男性移向殖民宗主國男性，並未賦予女子自體思考的能力，因而面對「自主權」的問題時，不僅未能超越〈女誠扇綺譚〉下婢所處的時代，所謂當代的「皇民」思想也顯得無濟於事。

澤野一方面著手查證阿木借據的內容，一方面勸慰寶玉的父母，讓寶玉完成女學校教育，準備應徵國民學校初等教員，隨著義務教育的實施，教導本島人小孩才能發揚女學校教育的意義。澤野以出征家庭的榮譽勸勉寶玉的母親，並以日本女性為標準，要母親作好盡責的皇民之母。至於當務之急的債務與人身買賣問題，澤野則打算交由警方處理，亦即依附於另一權力支配者，而不是提供即時的支援。

〈雨夜花〉曲調，由日本人粟原白野改填上日文歌詞，成了響應「聖戰」的進行曲。竹內清，《事變と臺灣人》（東京：現代書房，1939年），頁77-78；尾崎秀樹回憶當時總督府此舉反而使用雨打花落來比喻女性美與歲月無情的《雨夜花》原詞流行了起來，「盜用人們所喜愛的舊歌曲的旋律，然後烙上軍國主義日本的烙印，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整個過程中，這可能只不過是極普通的小事」。資料出處：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頁223-224。

³⁶ 和泉司，前引文，頁38-39。

從〈城門〉的富家女學生，到〈砂塵〉的貧窮女學生，作者透過教師處理女學生的煩惱，暴露了皇民教育的表面化現象，與指導階層一種感性的反省，展現了殖民地教師關切學生的熱情。然而這位介入皇民家庭教育的教師，雖然抱持著皇民教育者的強烈使命感，但一切以日本為基準的民族優越感也無所不在，而處處顯露了殖民指導者自以為是的安排。

五、留日學生的形象

〈訂盟〉³⁷以台灣的婚姻制度為主題，如果〈城門〉、〈砂塵〉是從女學生角度討論傳統婚姻，〈訂盟〉則是以台灣留日學生的婚姻觀為出發點，對婚期、聘金、嫁妝、納妾等問題，以一種近乎民俗考略的方式呈現，由台灣學生之口說明嫁妝、納妾等現象存在的現實意義，新垣再次表現其台灣知識考掘的成果。

這篇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敘述者「我」是在台灣出生成長的第二代日本人，對幼時與台灣小孩遊戲的往事覺得溫馨，但總令人感覺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想法。直到在台灣學生較多的高等女學校任教時，經常碰到男方家長來打聽婚約女子的高校生活表現，教職關係才令「我」開始關心每個人的想法與環境的關係，引發作者由「內台融合」的角度觀察台灣的現實面。

正在東京大學法學部求學並準備高等文官考試的在地菁英林文金，經由父母安排的結婚對象劉碧華正是「我」教過的學生，受日式教育的林文金也像日本人一樣拜訪「我」以打聽未婚妻的在校表現，對未婚妻的教養顯示了極高的理想性，主張未婚妻要進東京的女子大學受幾年薰陶以提升教養。所謂的「教養」意指在東京生活的見聞習染及女子大學的知識灌輸下，以脫去台灣人古老因襲的生活習慣：

我對畢業於台灣的女學校，卻成長在那無法脫離舊習慣的本島人社會生活中的女性，馬上當作妻子感到不滿。³⁸

³⁷ 本文依據《文藝臺灣》5卷3期（1942年12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³⁸ 同上註，頁88。

林文金的婚姻觀並不是強調戀愛的自主、婚姻的自由，卻相信女性的知識追求、日本教養，才能使夫妻談得來，才是進步婚姻的要件。「我」則認為女子大學未必能形成高尚的教養，如此也不是真正為妻子考量，認為是林文金為了滿足自我虛榮心的想法，以及面對環境的啟蒙性欲求的夢想，未必真正有益於婚姻生活，為人妻子重要的是現實洗衣燒飯裁縫等日常工夫，否則留學生活還帶著女傭，就無法建立「新本島人社會的改革化家庭生活」³⁹。

「我」對台灣的留日學生多選擇醫專以便將來方便謀生的現象，批評是為人父母者唯物觀的物慾主義思想作祟，對文科志願者稀少的現象感到不滿。文本中插入學生黃氏淑赴日習醫的動機，在於感慨某皇室成員病逝，恨不能替皇族犧牲，決定以醫學為人類奉獻一生。「我」肯定此種真誠的習醫信念，也改變了自己對習醫的台灣留學生單一印象。

林文金、林文龍兄弟的想法與一般台灣學生不同，令「我」稍感安慰，他們強烈批判台灣舊家族制度的缺陷。但令「我」好奇的是致力於新精神的林文金，為何在婚姻上聽從父母之命，而不是選擇戀愛結婚，「我」認為這是一種表現出調和舊道德與穩健醇風美俗的東洋式看法。

當「我」批評著台灣女性受金錢束縛（聘金或嫁妝），也得不到幸福的可悲時，傳來林文金屈服長輩迷信，認為農曆六、七月結婚會使妻子遭厄運，九月無吉日，決定將婚期延至寒假的訊息，「我」十分訝異於林文金的言行不一，後又聽聞碧華家準備了五位數字的嫁妝，「我」感嘆林文金先前的義正辭嚴只不過是空洞的理想。藉由留日學生婚姻的言行矛盾，說明即使是認同皇民教育的高階知識份子，口中呼應著新體制運動，實際卻未能割除台灣的舊習俗，為皇民鍊成投下變數。

將小說中留日學生與女學生的形象統合來看，敘述者期待著學校的日式教育可以直通皇民鍊成的道路，但就作者觀察所得，接受皇民教育者又時時與皇民鍊成的目標相左，在欠缺同理心的態度下，一個與學生頻繁接觸的熱情教師，

³⁹ 新垣宏一，〈訂盟〉，頁 89。

也只是對皇民教育所呈現的不協調反覆加以陳述，而再多的陳述也只是暴露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同床異夢的破綻。

六、原住民的形象

原住民作為在台日人小說家描寫的對象，始終不脫文明與野蠻、優秀與低劣的對立思考模式。獲得台灣為殖民地的日本帝國，發現了足以彰顯自身文明身分的野蠻人，他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凝視、想像原住民，並為原住民代言。日本殖民主義包含著文明與未開化（野蠻）二元對立觀念，以人類文明進步為同化未開化民族理由，正當化了殖民地支配行為。

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經營理論，中村勝認為是以「文明人」的中心思想，包裝上近代科學的生物進化論，對原住民逐步形成「未開化」者要受「文明人」「克服」「討伐」的觀念。從武力討伐到開發教化的「理蕃」事業，都是以生物進化主義的觀點，理直氣壯進行殖民戰爭與統治。藉「文明之名」對原住民強行馴服與教化，破壞原住民固有的生活結構，以便巧取豪奪產業經濟相關的資源⁴⁰。

日本人從殖民地原住民身上發現了「殘虐」、「情感幼稚」、「想法簡單」的「蠻性」，並因此確認自己的「文明性」⁴¹。從明治時期的討伐、大正時期的撫育，殖民地統治者對原住民的觀感，從蒙昧無知的「野蠻人」，到單純、順從、天真、可愛、純真無垢「蕃人」的修辭變化，在在顯示其「文明人」的自信與優越感⁴²。這種「文明化使命」所反射出的偏見與歧視，往往造成小說文本中原住民異化與壓抑的形象。

⁴⁰ 參考中村勝，〈植民統治と「科学以前的生活世界」の思想史的考察—台湾「教化植民地主義」における「理蕃」を中心に〉，《名古屋學院大学論集・社会科篇》41（4）（2005年），頁20-22、30、35。中村勝從思想的歷史脈絡觀察日本的殖民統治理論根據，指出理蕃中的「同化」政策，並不是從原住民社會進化論的觀點出發，所以不是生物學基礎理念所謂的使劣者（他者）進化或同化為優者（自己）的。理蕃政策所援用的生物學進化主義，只是優者本位的權宜機會主義，實際上是對劣者的全生活構造加以異化與壓抑。

⁴¹ 川村湊，〈大眾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アジア認識〉，收入《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7—文化のなかの植民地》（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7月三刷），頁115、119。川村湊從日本昭和初期描寫南洋、台灣、朝鮮等地的文本，討論昭和初期日本對亞洲異民族的「東方主義」觀點。指出涉及原住民描寫的文本，皆存在著作者以文明人觀看野蠻人的視線。

⁴² 參考山路勝彦，〈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年1月），第3章〈植民地台湾と「子ども」のレトリック〉，

對在台日人作家而言，原住民是絕佳的凝視對象，既富異國情調，又能展現台灣的地域特色，並寄託作者殖民教化的想像，新垣宏一的〈山の火〉⁴³（山之火）是典型的此類作品。主角河野兵吉在失親及貧窮的困境中，聽說台灣農業移民的種種，便與妻子攜幼子赴台發展。然而一介文弱書生無意成為拓荒農民，只能把妻小留在小鎮，經常在花蓮山上監督二十幾名阿美族工人採藤。藤蔓生長在古木雜生的高崖峭壁上，曲折縈紆得有如巨莽般，阿美族壯丁腰繫柴刀，身手矯捷，但工作地點危險，不時發生摔落受傷事情，反映了經濟利益下勞動者無保障的工作情形。

為了自己方便指使這些原住民，河野任取原住民原名中的幾個音，幫他們取了好叫的日本名，像把「拉達」叫成「太郎」，「比拉南」叫成「Konpira」（金毘羅）⁴⁴，命名本是寄託命名者期許的活動，改日本名字便帶有敘述者教化原住民的意圖。

和河野一起住在小屋裡的原住民青年太郎，負責煮飯、看管乾燥中的藤蔓。夜裡河野一邊讀著小說，一邊教太郎識字。太郎拿著鉛筆反覆書寫，內容不出：

神是偉大的人。河野先生的太太是美人。太郎。⁴⁵

河野告訴太郎神不是人，但太郎動不動就說「神」，只要是他以為了不起的，馬上就作「神」聯想，就像他經常掛嘴邊的「日本人是神」，塑造了一個完全臣服於殖民者的原住民男子形象。

回到家裡照顧瘧疾復發妻子的河野，不久便接到山上乾燥場失火的消息，火勢延燒至小屋，二萬斤的藤付之一炬，所幸沒有造成森林大火。但看管小屋的太郎負了傷並幾近瘋狂，在寫給河野的信裡，太郎充滿了自責：

頁 100-107。山路認為把原住民視為「小孩」，是殖民地官吏為了維持殖民地體制所虛構的世界，作為接觸、統治原住民時有效的政治理念與操作手段，與從法理政治面正當化殖民統治的「無主野蠻人」觀念是一體兩面，頁 94-95。

⁴³ 本文依據《文藝臺灣》5卷6期（1943年4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⁴⁴ 同上註，頁 59-60。

⁴⁵ 同上註，頁 62。原文為日文。

河野先生，請原諒我，是我不好。全部都被火燒掉了……我是壞人。
太郎。⁴⁶

本來安逸於現狀的河野，為了兒子未來的教育陷入了進城與否的掙扎，這場大火似乎終結了他的猶豫不決，作者主要表達的是移民來台者受風土病、天災及大資本家壓迫下的生存困境，而原住民青年「太郎」的存在，似乎是為了一掃河野在日本聽說台灣「山上住著可怕人種」⁴⁷的傳聞，親見原住民受教化的成果，一改野蠻的形象而溫馴如孩童，即使發展不順遂的日本移民，在原住民面前仍帶著揮之不去的優越感，成為實施皇民教化的一員。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發表的〈山の父親〉⁴⁸（山的父親），在山地工作了二十年的山田巡查，他在總督府工作的獨子文吾，特地從台北回山上探親。身為第二國民兵（丙種體格）也能入伍，文吾感到既興奮又滿足，自認為是部落裡第一個道道地地的軍人，正計畫從山上著軍裝出發。而在同一時間，山田巡查正忙著為村中首次出征的三名原住民青年梅田、松本、竹本舉行義勇隊送別會。竹本的未婚妻イロン（Yiron）執意在出征前出嫁，女方家長熱心的邀請山田在神社為新人主持婚禮，全文洋溢坐收「理蕃」成果的喜悅。小說以部落原住民高砂義勇隊的出征，與山地巡查獨子的徵召相對照，二者在不同民族的意義上，皆可視為山上首度出征的人，在人力資源的獲得上表現了「一視同仁」的意旨。

原住民作為在台日人小說家描寫的對象，獲得他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凝視、想像，並為他們代言。理應屬於帝國一員的原住民，被剝奪了發聲的機會，因此在馴服的過程中，原住民的抵抗總是被簡化為野蠻對文明的抗拒，以正當化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討伐行為。隨著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小說中的原住民也開始出現受教化、追求文明的形象，並且從叛亂者變為志願兵。然而受馴服的結果，我們也看到了原住民異化與壓抑的形象，敘述者以文明人的高度、救贖者的態度，形塑想像的蕃人世界，是原始、愚昧的，也會模仿文明人，是可教

⁴⁶ 新垣宏一，〈山の火〉，頁 71。

⁴⁷ 同上註，頁 66。

⁴⁸ 本文依據《臺灣鐵道》1943 年 11 月號，收錄於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22《台灣鐵道作品集二》（東京：綠蔭書房，2007 年）。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化的，合理化了日本人殖民台灣的行為，文本中的原住民看似獲得了較漢人觀點下更「正面」的形象，但也不出只是宴饗日本本土讀者的異國書寫，原住民始終是藏匿在文本背後沈默的族群。

七、工人的形象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本政府、翼贊政治會與大政翼贊會強化聯合發表「國民總蹶起運動」(國民齊奮起運動)，確立四項目標，即「戰意昂揚」、「生產增強」、「食料確保」、「國土防衛」。一九四四年六月，日本文學報國會在情報局、陸軍省、海軍省與大政翼贊會的支持下，召開「決戰體制即應日本文學報國會會員總蹶起大會」(因應決戰體制日本文學報國會會員齊奮起大會)，會中提出七大議題，其中第二項提案「增強生產躍進」、第六項提案「文學者的職場挺身」及第七項提案「決戰非常措施下的文學活動」，⁴⁹可視為促使台灣總督府情報課，透過「臺灣文學界の總蹶起」⁵⁰的作家表白，要作家配合至各增產場所完成報導文學的由來⁵¹。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總督府情報課的要求下，共有台、日作家十三名⁵²，被派至各生產工廠或工作場所，進行寫作的取材工作：

這個計畫並不是要作家光停留在表面的見聞，而是接觸實地在現場工作人員的氣息，體會他們的辛苦，而在現場停留一週，生活作息與他們完全一致，進而將見聞體驗當作素材寫成小說。⁵³

⁴⁹ 提案項目參考櫻本富雄，《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東亞戰爭下の文學者たち》(東京：青木書店，1995年)，頁425。中文為筆者自譯。

⁵⁰ (矢野)峰人，《臺灣文藝》1卷2期(1944年6月)，頁3。

⁵¹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序說》(東京：綠蔭書房，2004年)，頁243-244。

⁵² 13名作家與派遣地分別如下，呂赫若—台中州下謝慶農場；濱田隼雄—日本鋁工廠；新垣宏—台灣船渠工廠；西川滿—鐵道部各機關；張文環—太平山；龍瑛宗—高雄海兵團；吉村敏—公用地；高山凡石(陳火泉)—金瓜石銅山；長崎浩—太平山及公用地；楊雲萍—台灣纖維工廠；楊遠—石底炭坑；周金波—台南州下斗六國民道場；河野慶彥—油田地帶。參考《臺灣文藝》1卷4期(1944年8月)，頁2。

⁵³ 同上註。

這類增產文學是作家呼應總督府統治物資及擴充生產力計畫的命題寫作，並不是作家擅長的內容，也不是作家平日關懷的層面，目的是為了達到總督府情報課要求的：

如實的描寫台灣的戰鬥情形，以資啟發島民，並培養明朗溫潤的情操，振起邁向明日的活力，同時作為鼓舞激勵產業戰士的食糧。⁵⁴

派遣至台灣船渠工廠的新垣宏一於十一月發表〈船渠〉⁵⁵，在工場即戰場的口號下，描寫工人訓練所三年學成的工人黃明雲與林炎。二人同在船塢修船，林炎不滿薪水太少，為鄰近愛國造船廠兩倍的薪資吸引跳了槽。經過黃明雲「曉以大義」，提醒林炎「你應該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吧？為增產命令，船塢現在正全力以赴」，「大家都為國家，不，為天皇陛下工作著。」⁵⁶說服了林炎返回船塢勤奮工作。作者花了許多篇幅介紹台灣的戰略位置、船在戰爭中的功能，以及修護船隻的細節，突顯船塢工廠的重要性，帶有濃厚的報導痕跡與時局教訓特色，表現外地文學的特色，卻不能不說是敗筆。小說中以優厚的經濟條件，作為挑戰皇民化成敗的誘惑，再由皇民化的台灣人扮演產業戰士的示範者，可見作者將讀者設定為台灣人，但人物的描寫停留於表面化，為宣傳而創作的結果，使得作品失去文學性而淪為政策配合。

根據中島利郎的考察，在作家派遣前的三個月，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院副教授瀧田貞治以研究者的角度，即對「增產與文學」提出批評：

所謂增產文學可以靠紙上談兵之類的企畫完成，這終究免不了膚淺單純之識。

這樣想來，問題點其實就在於作家本身所持有的見識與態度，作家是否真正對時局有所認識，是否真能貫徹國家使命，不執著於小我而忠於職

⁵⁴ 矢野峰人〈序〉，《決戰臺灣小說集》乾之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0年），頁3。

⁵⁵ 本文依據《臺灣文藝》1卷5期（1944年11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⁵⁶ 同上註，頁21。

責所寫出的作品，就算並非以時局為正面的題材，其中必也自然滲出作家所持有的本質，斷然不會有與國家方向悖行的作品出現的餘地。⁵⁷

在總督府將作家一元化的動員策略下，作為文學研究者的瀧田貞治，對增產與文學關係的論述，實為先見之明，藉由報導增產來鼓勵人民為日本的勝利盡全力，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便容易被忽視。

然而總督府情報課與派遣作家似乎對瀧田的意見並未加以考慮。作家們將報導融入小說寫作中，是否考量了所謂的「產業戰士」究竟指的是誰？所謂的「增產文學」的讀者是誰？結果卻只是知識階級的「島民」、「產業戰士」才能閱讀的作品，對鼓舞激勵真正的產業戰士的目標達成應很有限⁵⁸。在總督府主導下的戰時文藝政策，尤其是協助戰爭的命題寫作，推行效果不彰的原因，如果不能歸究於主事者對文學的認知不足，那就是官方透過寫作題材的限制，在戰爭期間完成對文學的動員與作家的控制，才是真正的目的。

八、小結

在台日人評論者島田謹二發表於一九三九年的〈臺灣に於けるわが文學〉⁵⁹（在台灣的我國文學），指出外地文學的三種志向，即「外地人的鄉愁」、「描寫土地的特殊景觀」（異國情調）、「解釋土著人的生活」（寫實主義）。主張此後在台日人文學除了「鄉愁」與「異國情調」外，更要有「寫實主義」的發展。橋本恭子分析島田的主張，指出「描寫土地的特殊景觀」的「異國情調」文學，是將台灣當作美麗的風景納入日本文學中，進而在讀者意識中奠定新領土的既得權。「解釋民族生活」的「寫實主義」文學，是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共同生活視為「既成的事實」而言說化，以鞏固殖民統治，可以說是從文化層面鼓勵完成殖民扎根⁶⁰。觀察創刊號即刊登島田的〈外地文學研究の現狀〉一文的《文

⁵⁷ 瀧田貞治，〈增產と文學〉，《臺灣公論》9卷3期（1944年3月），中譯引自黃英哲主編、邱香凝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頁463。

⁵⁸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序說》，頁218-222。

⁵⁹ 松風子，〈臺灣に於けるわが文學〉，《臺灣時報》1939年2月，頁48-59。

⁶⁰ 參考橋本恭子，前引書，頁134。

藝臺灣》，其後各號出現的在台日人小說，明顯取材於台灣社會，而且朝島田所倡導的外地文學理論發展。

對在台日人作家而言，「台灣文學」的意義是建立在「台灣」作為「日本新領土」、「日本南進基地」之下，因此，一方面無法不注意日本中央文壇的動靜觀瞻，一方面也必須追尋殖民地的文化特色，企圖摸索出「領台」近四十年所形成的在台日人文化。「台灣」在當時被作家稱為「本島」，相對於被稱為「內地」的日本原有領土，台灣是「殖民地」、「外地」，身為移住「外地」的在台日人仍自稱「內地人」。而出生成長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在日本本土的地位遭邊緣化，殖民地的灣生如何看待被殖民者，本土的日本人便如何看待灣生，灣生如何也不可能找回殖民地化以前的自己，只得嘗試從自己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視角出發，企圖對自己的主體性加以合法化，對宗主國文化作一種邊緣性的補充和裝飾⁶¹。

我們如果從灣生的角度審視新垣宏一的小說，他在身分認同上進退失據的情形表現得並不明顯，在他娓娓而談的敘事風格中，他不忘為預設的日本人讀者介紹台灣的地域文化，在或敘或論的縫隙中稍顯對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批評，但總是在深入探究前便鳴金收兵。以新垣在台灣發表的最後一篇小說一九四五年一月的〈いとなみ〉⁶²（營生）為例，一九四三年底起，美軍開始對台灣進行轟炸，躲空襲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垣宏一描述知識階層教師「我」與妻子在空襲下焦躁不安的生活狀況。不愛勞動卻愛書成癡的「我」，更加重了妻子的焦慮，妻子擔心一屋子的藏書在空襲爆炸時恐會壓傷人，又苦於糧食配給不足，在狹小的空地上蓋雞舍養雞，一點一滴的耕出個小菜園。與母親同住的弟弟勇吉考上了特幹兵，臨出發前幫母親挖好了防空壕。隨著空襲頻繁，「我」也賣力的挖起了防空壕。空襲發生時，幼年曾在日本東京震災時吃過苦的妻子，把裝糧食的大鐵罐、熱水瓶和米箱都塞進狹窄的壕溝裡，夫妻為此又起了爭執。文末「我」一邊自我鼓勵「不管多少年，絕對不能讓敵

⁶¹ 參考博埃默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23、157。

⁶² 本文依據《臺灣文藝》2卷1期（1945年1月），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人摧殘我們的精神與肉體」、「將大空襲作為人生的再生」⁶³，一邊繼續挖掘自家的防空壕，呈現戰時體制下知識階層的空虛。全文隱含著因戰爭而生的無可奈何，卻不能對戰爭提出疑問⁶⁴。

新垣宏一的灣生經驗使得他對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能有較清楚的形象掌握，他寫流浪兒、貧女、原住民等社會弱勢，取材異於其他在台日人作家，展現個人身分特質，因為擔任教職，尤其擅長描寫學生，以及融洽的師生關係，但他不能忘卻的日本人身份，不時以殖民者的聲勢出現在文本中，在階級、性別上所反映的矛盾衝突顯得薄弱。新垣雖不至於是兩邊皆不著邊的無奈性格，也不是搖旗吶喊型的軍國主義擁護者，他的小說呈現出有如一個奉公守法教員的形象氛圍，在大環境中即使稍有波瀾，也是小心應對不落兩邊。因此小說在發揚皇民精神之外，也稍稍帶着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執著，在積極表現皇民指導者的熱忱中，對皇民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也不刻意文飾。

新垣宏一以自身在台成長的經歷提出的文學理念，和島田的外地文學理論並無二致，尤其在「描寫土地的特殊景觀」和「解釋土著人的生活」上的著力，因而新垣的台灣書寫可說並未擺脫「異國情調」的色彩，帶著殖民指導者意識，即使以被殖民的弱者為對象，在缺乏同理心的寫作高度下，新垣以一種自我滿足的「台灣知識」⁶⁵實踐「解釋民族生活」的寫作理念。

⁶³ 《臺灣文藝》2卷1期（1945年1月），頁14。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⁶⁴ 當時作家很難留下批判戰爭的文字，日本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隨之進入戰時體制，同年9月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1938年通過〈國家總動員法〉，一切國民生活均受政府嚴格統制。文化統制也藉由檢閱制度逐步強化，嚴禁發表批判或反省戰爭的作品。日本當局干預打壓文化界反戰思想的情形，以島木健作《再建》、石川達三《生きてゐる兵隊》（活著的軍隊）遭禁為代表。《再建》以農村為舞台，反省1932、33年的農民運動，從現實性實踐性的立場批判日本的革命運動。由中央公論社派遣至華中的石川達三，就南京淪陷後的華中見聞寫成《生きてゐる兵隊》，將戰爭的實況傳達給讀者，要求為勝利而驕傲的後方人員要深刻反省。兩書遭禁一事讓作家們明白戰時下的文學走向，與戰爭描述的界限。參考市古貞次編，〈戦争と文学〉，收入《日本文学全史》6（東京：學燈社，1994年），頁258-267；紅野敏郎、三好行雄等編，〈戦争下の文学〉，收入《昭和の文学》（東京：有斐閣，1992年），頁157-159。

⁶⁵ 和泉司透過〈砂塵〉中野澤老師所表現出善良卻又事不關己的言行，指出新垣不自覺的將台灣客體化，他的學經歷使他成為典型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在文本中展現日積月累的台灣民俗考察成果，但充其量只是把台灣當作「他者」，以一種他人之事的態度描寫台灣人皇民化遭遇，最終仍不脫依恃支配權力來處理皇民化問題，只是在小說中鑲嵌台灣知識以滿足自我。前引文，頁43-44。

身為在台第二代日本人，新垣極少在作品中流露出第二代「外地人的鄉愁」（島田語），筆者認為這是新垣努力擺脫「灣生」形象的表現。在日人小說中反映出灣生普遍不把台灣視為故鄉，並努力與日本本土保持著系出同源的關聯，他們故鄉觀在父母內地的故鄉和自己出生的台灣之間擺盪，這種自我認同的扭曲，出自於對台灣的不關心與優越感作祟。庄司總一《陳夫人》中的在台日人第二代西道子、第三代島田登枝，都很羨慕日台混血兒陳清子去過日本，感嘆著內地是「遙不可及的山，住那裡是幸福」⁶⁶。即使在台灣已有先人的墓地⁶⁷，具備成為故鄉的事實，卻仍要否認這事實，無法擺脫自己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個真正故鄉的意識，在不協調與卑屈的情感下有著奇妙的鄉愁。新垣曾為文呼籲在台日人不要沈溺於望鄉的題材，雖然未能為在台日人接受，但顯示新垣努力突破「灣生」的刻板形象。

新垣的小說以自己生活範圍所能觸及的問題，透過對小人物的觀察刻劃，持續表現對主題的關注，確實表現出與其他在台日人小說家不同的個人特色，可說是完成了他在殖民文學中的自我期許。

⁶⁶ 庄司總一，《陳夫人》，頁 249-250。

⁶⁷ 同上註，頁 249。

